

●历史文化研究

扎西会议背景下中央红军缩编及扩红问题研究

唐靖¹, 方慧²

(1. 昭通学院 人文学院, 云南 昭通 657000; 2. 曲靖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云南 曲靖 655000)

摘 要: 扎西缩编, 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扎西会议所通过的一次重要军事缩编活动, 在一些相关回忆中也称为“扎西整编”。此次缩编既有前期红军编制整改的铺垫, 也是部队严重减员后危急存亡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通过整编, 一方面压缩机关编制, 充实基层战斗队的兵力; 另一方面以扩红的形式补充红军队伍, 并组建川南游击队, 播洒革命火种。通过分析与扎西缩编有关的红军往来电文, 以及红军指战员的相关回忆, 使得此次缩编的原因、背景、命令发布、缩编实际过程、扩红工作成效等一系列问题得以厘清, 为扎西会议的深入研究提供必要的补充。

关键词: 扎西会议; 红军缩编; 扩红

中图分类号: D23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7408 (2022) 04-0102-06

1935年2月初, 长征中的中央红军转战云南, 在威信停留期间曾先后召开系列会议, 史称“扎西会议”, 其重大议题之一, 即发布《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 对历经严重战损的各部队进行精减缩编, 实为两年红军长征史上最大一次缩编, 史称“扎西缩编”, 也称为“扎西整编”。本次缩编使红军得以跳出重重包围圈, 摆脱敌军围追堵截的困境, 从而为胜利到达陕北、完成长征奠定重要基础。目前有关于“扎西缩编”的史实, 散见于当年中央红军往来电文及红军指战员的各种回忆材料; 相关文章约有近10篇, 其中主题指向明确且较有含量者, 有谭备战^[1]及卓人政^[2]两篇。本文以此为基础, 分析扎西缩编的原因背景、缩编过程及历史意义。

一、中央红军扎西缩编的原因与背景

中央红军在扎西缩编, 是长征以来诸多因素的必然结果, 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 部队机关太大, 庞杂累赘, 行军难于机动, 亟需改变被动局面。

长征初期计划, 原只是到湖南与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师, 建立新的根据地, 这样只是简单地从江西转移到邻省湖南, 缺乏对未来困

难的心理预期, 因而在转移过程中实施了后来称为“大搬家”的做法, 导致行军迟缓, 一再错失摆脱堵截的良机, 也严重削弱部队的战斗力。

时任红三军团连长的黄荣贤也以基层干部的视角回忆说: “光是军委纵队就拉开了十里, 还有军团、师的后勤组织, 没用的印刷机、没炮弹的重炮、没布的缝衣机, 一大堆坛罐罐都带着, 我们在后面顶着追兵打半天, 他们在前边挪不了两里地。”在乌江边上的战斗中, 各部队机关拖“家”带“口”, 人拉车推地大搬家, 各局、各部、各科稀稀拉拉。为了掩护这些机关, 三军团六师拼命阻击吴奇伟的反击, 付出了重大损失^[3]。

其二, 湘江大战以来, 部队伤亡太大, 减员严重, 迫切需要充实一线连队。

1934年12月, 中央红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 突破湘江封锁线, 部队由8万余人锐减至3万。其中, 红三军团红6师18团被完全打散, 在撤往遵义的行军途中, 被迫撤销了师部; 16团编给了4师, 17团编给5师, 红三军团从三个师减为两个师, 剩余二师的兵员稍稍得到补充, 比起此前的“空架子”, 战斗力反而略有增强。红军退出遵义后, 原中央警卫团也撤销, 人员充实各部队, 警卫团团长姚喆到4师10团任团长。此后再经土城之战的失

收稿日期: 2022-06-27

基金项目: 2022年云南省民宗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项目“滇东北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合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唐靖(1972—), 男, 云南昭通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方向的研究。

方慧(1965—), 女, 云南会泽人, 主要从事历史教育教学研究。

利,红4师第12团到扎西时只剩300多人。为了适应大规模的运动战的需要,便于连续作战,充分发挥机动能力,部队缩编已经势在必行^[4]。

二、进入扎西之前红军缩编的酝酿

中央红军在进驻扎西之前的转移途中,其实早已有程度不同的整编:其一,1934年11月17日,部队到达湖南,中革军委发布《红八、九军团进行改编的命令》,将第八、九军团原来的两个师都改编为一个师,撤销两师的人员装备,分别补充到各军团。其二,湘江战役后的12月4日,队伍行至湖南老山界,中革军委又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决定缩编各军团后方机关,以提高部队战斗力和机动性。此次缩编主要是取消师的后方机关,取消兵站,缩小医院和卫生队,缩小直属队,充实战斗部队。另外,检查担子,不必要的应抛弃、毁灭;伙食担子应减到最低程度,粮食就地供给,预备粮食由战士个人携带^[5]。其三,在中共中央12月13日召开的通道会议上,中革军委又发布《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的决定及其办法》,正式决定取消原红八军团番号,将其剩余人员并入红五军团,其他部队则没有进行整编^[6]。

中革军委发布的以上两条《命令》一个《办法》,主要针对部分军团及师级以上机关进行调整,适当缩编后勤机构。对各军团的团级以下战斗编制未作调整,加之行军中途,从而使编制调整实际上未能真正贯彻落实,通过改编以增强部队机动性的目的也未实现。反之,尽量减少指挥层级和非战斗人员数量,充实基层战斗连队的有生力量,早已成为扎西缩编前非常迫切的现实问题。中共中央在1934年12月31日夜间召开猴场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明确提出“必须尽量利用我们所争取到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并进行整顿补充工作。特别加强在连队的政治工作,在充实战斗连的原则之下,应缩编我们的部队,军委纵队必须继续缩小,以适合新的作战环境。”^[7]

1935年2月初,经历土城失利后的中央红军转战威信,各军团原有番号虽然依旧存在,但许多部队都只是空架子,战斗部队人员缺乏,机关后勤冗余明显,此后的扎西缩编,正酝酿于土城鏖战后的—渡赤水。1月29日拂晓前,红1师在元厚场渡口准备渡河时,毛泽东曾对师长李聚奎、政委黄甦、

政治部主任谭政三人谈及遵义扩大会议情况、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时,顺便提出部队缩编的必要性和初步思路:当时许多红军部队“名义上虽是一个师,实际上只是一个团”“就只有那几个兵”,因此“部队要进行缩编,准备把师改为团”^{[8]116-117}。

而在转进扎西途中,五军团首长董振堂、李卓然鉴于本部大幅减员的现状,因而在向摩尼转进途中的2月4日16时,就联名致电军委主席朱德并保卫局邓发局长,基于“为着充实战斗连(队)适应目前需要”,提出对五军团实施缩编的具体办法:

(甲)每营暂编成2个连,使每连有战斗员50个上下。

(乙)保卫分局只留工作人员与政治部合并(办公),保卫队、特务队尽编(入)战斗连(队)。

(丙)迫(击)连因弹缺,决为1排共2门炮,与工兵连合编为工炮连。

(丁)卫生部监护排取消,编到连上去。

(戊)现各团轻重机枪都无弹药,请军委尽量设法补充一部分。

(己)乙项应请保卫局批准,以便执行;戊项请军委示复;其余各项已在进行中^[9]。

2月5日18时,董振堂、李卓然两位军团首长经进一步协商后,再次致电中革军委,提出《建议五、九军团合编为1个军团》的建议及实施办法:“(甲)为着充实我们的战斗力,减少各种浪费,适应目前的须(需)要,我们提议五、九军团合编为1个军团。(乙)两个军团的编制,在使用和指挥上极不顺利的,我们如五、九军团不能合编时(我们五、九军团如不能合编时),则五军团不宜缩编为两个团。依我们4日16时的提议,尽量减少直属队的人员充实连上,并(将)我们现有的两个新兵连迅速补充到连上去,仍保持3个团的建制,每团3个营,7个连,保证每连有60个战斗员以上。”至此,红军缩编问题已经呼之欲出,只欠一个适当的休养时机和地点。

三、扎西缩编的相关电文指示

1935年2月6日-7日,中共中央在石坎庄子上召开政治局会议,会后以中革军委的名义致电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等各军团首长,提出“进行与滇敌作战的一切准备,并争取在该集中地域的休息和缩编”“缩编”一词正式出现。据时任

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回忆,这一次的“缩编”令与彭、杨有关:由于“红军在行军中落伍的人数比较多”“2月7日,彭总和我向军委建议:转向鸡鸣三省地区的云南扎西(今威信),进行部队整编,‘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军委采纳了我们的意见”,当天作出这份《关于红军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的方针给各军团的指示》^[10],其内容为:

甲、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乙、依此方针,我野战军目前作战任务是:

1. 迅速并立即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集中。
2. 进行与滇敌作战的一切准备,并争取在该集中地域的休息和缩编。

3. 对沿途地主碉堡,在不防〔妨〕碍我军行动条件下暂让其存在,如向我开枪阻我前进,应销毁或监视之敌、我野战军明八号行动,另电告^[11]。

1935年2月7日19时,朱德总司令再致电各军团,决定红军8日主要行动的部署:令红1军团由洛表等地向通镇雄大道集中,红3军团开至扎西地域,红5、红9军团均向镇雄前进,红军在威信、镇雄地区赢得宝贵的喘息时间,也使红军缩编提上了日程。

2月9日夜,中共中央在威信江西会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部队缩编命令颁布于2月10日凌晨2时的扎西镇,这一《中革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规定:

甲、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并规定具体办法如下:

1. 一、三军团均取消现有师部的组织,各以新颁布团的编制表编足四个团;

2. 五军团将现有的三个团依新颁布的编制编为两个团;

3. 九军团将现有人数(军团部在内)以五分之三的人数依新编制编为一个团,并入五军团为其第三个团,其余五分之二的人数编入三军团;

4. 一、三军团军团部应依颁布的新编制改编,其多余的人员应尽量补充到战斗连中去,其一部经过宣传与选拔,可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

5. 五军团部应依照师部的编制改编,多余的人员处理与上项同。

乙、为实行上项缩编,各军团应在干部与战士中进行必要解释的充分准备工作。

丙、各军团的新兵,一般的应利用此次缩编补入到各战斗连中去,惟大烟瘾尚未戒脱的新战士,则仍留新兵连训练。

丁、各军团应利用休息的间隙期中进行缩编,其日期由军委个别命令规定之^[12]。

综上所述,红军整编问题酝酿于湘江之战前后,1月29日一渡赤水时毛泽东开始有比较明确的思路,2月4日至5日进入威信县境时五军团最早提议并开始军团内部缩编,中革军委则于2月7日的大河滩会议发出“缩编”指示,扎西镇的江西会馆会议正式颁布了“缩编”的命令,前后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四、中央红军扎西缩编的实际情况

由于战争与行军原因,计划中的缩编只能一路走一路利用休息的间隙进行,但却始终未能有效开展。前述五、八军团的合并,中革军委的《决定及其办法》中原要求“五、八军团应利用行军中的间隙执行此电令中一切规定,限十八号前全部完成”,在实际操作中就很难达到。也正因为有种种客观因素的制约,各军团的缩编并未如期全部实施,从而导致不同的当事人也有不同的回忆。

1983年,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聂荣臻元帅通过其办公室回复扎西纪念馆关于扎西会议的提问,其中涉及扎西整编问题是这样说的:“扎西整编命令,当时军情紧急,实际上都没有执行。”联系到聂办对扎西纪念馆复信中第四、五问题的答复均为“荣臻同志都记不清了”,因而对扎西整编的回忆同样存在记忆上的模糊。这一记忆模糊有其重要的客观原因,就在于聂帅所在的红一军团,其缩编实际并未按照《中革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所要求的那样取消现有的师部组织,也是唯一没有取消师部组织的军团。

在红一军团1师师长李聚奎的回忆录中,提及1月29日在元厚场毛泽东与他的对话,可以从侧面解释其中的原因。当时毛泽东问他:“你们师还有多少人?”李回答说:“还有3000多人。”毛沉吟:“3000多人编一个团又太多了点,这个到时候根据

情况再定吧!”结果后来到扎西整编时,就考虑红一军团减员不多,再加征战倥偬,肩负重任,故而除把师直属队精简之外,其余编制未变^{[8][103]},仍保留了第1、第2两师,第1师辖第1、第2、第3团,第2师辖第4、第5、第6团。此外,“四员”(即司号员、理发员、炊事员、通讯员)以及保卫局、供给部、掩护队、运输队等,都精简到战斗连队^[13]。

除红一军团外的各部队与机关,均服从中央命令,顺利完成缩编任务。各军团在撤销师级指挥机构后,原来的师、团、营、连干部被层层下放。与红一军团同为主力军团的红三军团,一个月前在遵义附近的懒板凳(今遵义南白镇的中心城区)进行改编时已取消了一个师的番号,本次扎西缩编,同样取消师一级组织,为了编足一线战斗单位,统一缩编为四个团,即第10、11、12、13团,直属军团部指挥,可见在转战中损失之大。因为袁国平病了,中央派刘少奇同志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又派伍修权为副参谋长^[10]。整编后的一个团约为两千余人,实际相当于整编前的一个师,在连队人员充实后,部队战斗力明显提高^[14]。

时任红三军团四师政委的黄克诚回忆说:我军经过川南进至扎西时,刚过春节没有几天。根据1935年2月10日中央军委关于缩编的命令,中央红军集结于扎西开展整编。红一、红三军团均取消师的建制,各缩编为四个团。红三军团撤销两个师部后,共缩编为四个团。缩编后各团的主官情况是:第十团团团长张宗逊、政治委员黄克诚、参谋长钟伟剑、政治部主任杨勇,第十一团团团长邓国清、政治委员张爱萍、政治部主任王平(后任政治委员);第十二团团团长谢嵩、政治委员钟赤兵(娄山关战斗负伤后,由苏振华接任),参谋长孔权;第十三团团团长彭雪枫、政治委员李干辉(后为张爱萍)、政治部主任黄春圃(江华)^[15]。

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整编后任第十一团政治委员的张爱萍也回忆:“我们到达扎西后,虽时值严冬,夜间降雪,仍继续紧张地完成了整编工作。”各师师部撤销,军团机关及直属队实行彻底的精简,从师长、师政委到基层连、排、班长,层层下放。这样,就出现经过缩编后一个班里10个战士均为原连级干部,“精简大整编,连长下到班;班长黄荣贤,率领一个团(十个连长为一个团)”^[16]的趣闻。

五军团长征初期时,原下辖十三、三十四两个师。长征过湘江时,三十四师担任后卫掩护,遭敌人重重围攻,大部牺牲,未能渡过湘江。此次扎西缩编时,原定“将现有的三个团依新颁布的编制编为两个团”,经协商后撤销红十三师番号,但改为三个团,即第37、38、39团(部分文献认为没有38团^[17])。红九军团在整个方面军中是一个新的军团,1933年10月建成军团时起,便开赴福建前线,投入反“围剿”斗争。军团人数较少,短小精悍,宜于机动作战。长征开始时,军团共11000余人,枪3650支。1935年2月扎西整编时,全军团只余3000人左右,按《各军团缩编命令》的安排,九军团人员拟按照不同的比例,分别并入三、五军团,充实后者的战斗力。但实行的结果,红九军团并未撤销,只是取消了第二十二师和第三师的番号,将原三师的三个团缩编为三个大营,对外仍然称三个团,即七、八、九团,直辖军团部指挥。军团长罗炳辉、原政委蔡树藩在整编后由何长工接任,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黄火青,供给部长赵镔、中央代表王首道。此外,还有教导大队、侦察连、特务连、通讯队等。人员虽少,但组织精干,连队充实,火力配备强^[18]。

扎西缩编,重点在增强连队战斗力量。同时,中革军委对后勤机构也进行了调整,原总供给部被撤销,与总司令部四局合并;总卫生部下辖的“红星”医院,改编为两个干部休养连。整编中,各部队进一步轻装,抛弃了笨重难带的辎重^[19]。部队为了实行轻装,总部命令规定:(1)军团长只能带1个挑夫,团长、政委各只有1匹马。(2)红军女战士只留少数跟着走,其余都留在地方。红军用大洋、烟土作为安置伤病员、女战士的费用,同时选拔一部分红军指战员打游击。(3)凡是两人抬不动的东西都甩掉^[20]。这样,在扎西组建了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伤病员及女战士得到妥善安置;许多笨重的机械设备如没有炮弹的大炮、没有子弹的马克沁重机枪等,通通被埋藏或弃入水中。总卫生部有台美国造的X光机,是上海地下党作了极大努力才搞到手并于1933年运往苏区的。长征开始以来,这台机器装在一个大木箱里,由几个人抬着,从中央苏区一直抬到贵州和云南舍不得丢掉,这一次也被“精简”,留在大河滩附近杨家寨一个老乡的家里。

五、与缩编同时开展的扎西扩红

中央军委所颁布的关于扎西缩编的命令中,原本并无“扩红”的内容,但是实际上由于长征途中红军伤亡惨重,兵力损失巨大,所以红军每到一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扩充红军力量,即所谓的“扩红”工作。

在扎西缩编、轻装的同时,中央红军同样以各种方式进行补员扩红。红军几个军团先后到达威信,在威信前后停留了十一天,足迹遍及了威信县扎西镇、九个区、五十余个乡(镇)。2月8日,相继在扎西的江西庙、河坝头召开了平民大会,向群众宣传苏维埃政策和北上抗日,并演出了文艺节目。据当地人和一些老红军回忆,虽然处于长征的艰苦行军途中,但当时的红军戏剧工作者,用一些简单的宣传工具作了精彩的演出,演出的节目有兴国山歌(宣传抗日的新词)、“红军和干人是一家”“我当红军去”……等,宣传红军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及和群众的鱼水深情^[21]。

红军所到之地,热情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讲明红军是工农的子弟兵,是为穷人谋翻身解放的队伍。动员群众积极组织起来,打倒“国民党军阀和土豪劣绅”的反动统治,取消地方的一切苛捐杂税,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各处都书写了“云南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只有苏维埃工农革命才能救中国”“红军为民不为己,打富救贫”等标语。威信至今留存中央红军在扎西扩红的有关文物和资料以及数十条红军标语、麟凤柏香坪一农户板壁上书写的《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22]。除扎西外,在大河滩、长官司、罗布坳、三口塘、斑鸠沟等地,都召开过穷民大会进行宣传动员。云南官员多为彝家,红军进入威信即以各民族解放为口号,以取得汉、回、苗各民族的同情^[23]。

红军买卖公平,纪律严明,也给当地民众做了很好的言传身教。在大河滩王国安家拿了十多个鸡蛋,主人不在就留下条子、银元放在柜子里;扎西风雪飞舞,不少红军仍露天搭棚宿营,不住群众的内屋;途径天蓬寨遇一苗族妇女生孩子没吃没穿,红军即送给棉被并派人照护;在观音七林坳,红军还冒着危险冲入起火的碉口,抢救出被困在烈焰中的小孩贺天佑。各族群众在亲人的感召下,也积极为红军带路、舂米、打草鞋、报告

敌情、帮助治疗和掩护伤病人员。各路红军在威信的水田、石坎、大河院子、田坝、双河、石龙、扎西、桂花、观音、高田、文兴、松林、旧城、罗布、三桃、斑鸠、林凤等地,打土豪分财物。他们打开团防的碉堡,缴获武器,打击了一批土豪地霸,处决了一些罪恶严重的头目,没收了他们的财物,除供给红军外,向群众分发了盐巴、粮食、猪肉、衣物等^[24]。

在红军宣传鼓舞下,威信出现各族民众踊跃参加红军的景象。原任威信设治局长、后在滇军第2旅任文职的叶天荣,2月前来会晤红军领导人,会晤后即随红军而去^[25]。原中革军委二局党支部书记、译电员戴镜元回忆道:“在扎西一带,我们又扩大了红军3000多人。这里参加红军的情况非常热烈,他们不是三个、五个地参加,而是成批成批地、几十个几百个地参加。云南的各个兄弟民族受云南军官官僚地主豪绅的剥削和压迫很深,一号召打云南军阀,群众就纷纷响应,踊跃参加红军。”^[26]红军在扎西扩红达三千人之多,而参加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人数也不少,初步统计前后共达数百人。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后,在陆定一、贾拓夫合作编写的《长征歌》中,就以诗歌的形式记述了扎西缩编、扩红、建立川南游击纵队等内容: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27]。

六、结语:扎西缩编与扩红的历史意义

扎西缩编是解放军军史中的一件大事,它使战斗连队大大充实,机动性提高,适应性增强,自然达到适应当时战斗需要的缩编目的。胜利的基础在于夺取战略主动权。而扎西大缩编正是夺取战略主动权具有决定意义的部分。中央红军的缩编,早在黎平、猴场、遵义已经分别进行。而扎西缩编酝酿于1月29日,发起于2月4日,7日作出缩编指示,10日颁布正式“缩编的命令”,其间经历了一个不断尝试、不断完善的过程。

扎西缩编解决了过去行军中几次缩编没有很好解决的关键难题,即中央纵队及至各部机关的彻底精简,后勤机构消肿,笨重的装备和器材最终丢弃,抬轿子、大搬家的行军方式得以结束,从而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机动能力。正如张爱萍将军所回忆:“全军士气高涨,斗志奋发,充满了‘不怕打,不怕走,不怕饿、不怕累’的战斗精神”^[28],为后来行军过程中夺取战场机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谭备战. 扎西缩编: 红军长征途中在云南扎西的军队建设 [J]. 传记文学, 2017(8): 30-37.
- [2] 卓人政. “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记红军长征中在威信进行的最大的一次缩编 [J]. 云南档案, 2006(5): 14-16.
- [3] 黄荣贤. 我所经历的扎西整编 [C]// 杨胜群、陈晋. 红军长征重大决策见证录. 北京: 三联书店, 2006: 147-148.
- [4] 原一军团保卫局战士刘挺同志访问记录摘要, 原干部团主任教员王智涛同志访问记录摘要 [C]// 张家德. 遵义会议系列研究——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4: 115.
- [5] 费侃如. 红一方面军长征日记 [M]. 北京: 东方出版中心, 2006: 49.
- [6]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 第 1 册 [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6: 188-189.
-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1935 年 1 月 1 日) [C]//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0 册.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446-447.
- [8] 李聚奎. 遵义会议前后 [C]// 遵义会议的光芒.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4.
- [9] 董振堂, 李卓然. 关于五军团对部队编制所采之办法及提议 (1935 年 2 月 4 日) [C]// 张家德. 遵义会议系列研究——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4: 113.
- [10] 杨尚昆. 杨尚昆回忆录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124.
- [11] 中革军委关于红军改为以川滇黔边界的方针给各军团的指示 (1935 年 2 月 7 日) [C]//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0 册.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483-484.
- [12] 中革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 (1935 年 2 月 10 日) [C]//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 12 册.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78-79.
- [13] 原一军团曾川同志访问记录摘要 [C]// 《红军长征过云南》编写组. 红军长征过云南资料选.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77: 1-7.
- [14] 谢振华. 扎西整编前后 [C]// 中共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红军长征过云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6: 67.
- [15] 黄克诚. 我在红三军团的经历: 下 [C]// 杨胜群, 陈晋. 红军长征重大决策见证录. 北京: 三联书店, 2006: 155-156.
- [16] 黄荣贤. 我所经历的扎西整编 [C]//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编审委员会.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回忆史料: 第 2 册.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6: 62-70.
- [17] 卢权. 中国工农红军 (解放军) 的发展及序列简况 1927-1949 [M]. 增订本. 广州: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 1983: 93.
- [18] 军事科学院《罗炳辉传》编写组. 罗炳辉传 [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6: 196.
- [19]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1927 年 8 月-1937 年 7 月): 第 1 卷 [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0: 370.
- [20] 原中革军委司令部通讯班长杨汉辉同志访问记录摘要. 红军长征过云南资料选 [C]// 张家德. 遵义会议系列研究——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4: 115-116.
- [21] 黄光辉. 星火照云崖——忆红一方面军长征过云南在扎西、会泽的几次演出活动 [C]// 昆明市政协会. 昆明文史资料集萃: 第 5 卷.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09: 3349.
- [22] 威信县年鉴编纂委员会. 威信年鉴 2006 [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7: 194.
- [23]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云南史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6: 286.
- [24] 中共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威信历史: 第 1 卷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47-48.
- [25] 张家德. 红军转战云贵川论集 [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2: 354.
- [26] 中国现代史学会. 长征档案: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 中卷 [C].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548.
- [27] 定一, 拓夫. 长征歌 [C]// 革命战士歌谣选.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61: 72-73.
- [28] 张爱萍. 从遵义到大渡河 [C]//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回忆史料: 第 2 册.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6: 38.

Study on the Reduc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Central Red Arm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Zhaxi Conference

TANG Jing¹, FANG Hui²

(1. School of Humanities, Zhaotong University, Zhaotong 657000, China; 2. Quj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 Qujing 65000, China)

Abstract: Red Army downsizing in Zhaxi was an important military drawdown activity approved by the Zhaxi Conference held during the Long March of the Central Red Army. The downsizing not only paved the way for the rectification of the Red Army's establishment in the early stage, but also was carried out und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being in danger after the serious downsizing in the war. On the one hand, the re-organization cut down on staff number and enrich the strength of the grass-roots combat teams;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d Army was supplemented in the form of increasing new soldiers, and southern Sichuan guerrillas were also formed to spread the flames of revolu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d Army telegrams related to the reduction of Zhaxi, as well as the relevant memories of the Red Army commanders and fighters, a series of issues such as the reason, background, order issuance, actual process of reduct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Red Army expansion can be clarified, so as to provide necessary supplements for the in-depth study of Zhaxi Conference.

Key words: Zhaxi Conference; Red Army downsizing; Expanding of the Red Army